

■新作聚焦

周大新长篇小说《预警》

指向时代和社会的预警

□石长平

早在2006年,周大新就表示,针对自己较少涉及军事题材的情况,接下来会写一部反映和平年代军人生活的作品。多年构思积淀,半年辛苦笔耕,终于,他的第一部当代军事题材长篇小说《预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面世了,这是他在继长篇小说《战争传说》之后在军事题材方面的又一大重要成就。

实际上,在近年30年的创作过程中,周大新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军事题材小说的探索,他曾把军旅小说分为三类并作出了比较成功的试验。一类是战争小说,直接表现战争,如他的《走廊》;一类是关于古代军事博弈的小说,他写了《战争传说》;一类是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如《铜鞮》《汉家女》等。周大新认为,最后一类是最不容易写的,这么多年没有写出来这方面的长篇,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这次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切入点:从一支机密作战部队的作战局局长入手,讲述了一个谍战加反恐的故事。这样,周大新从“南阳盆地”的乡土记忆和文化抒情中突围出来,实现了以长篇小说反映当代军人生活的夙愿,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他的创作空间。

《预警》中的主人公孔德武是998部队作战局局长,年过五十,业务精湛,正师级大校军衔,且提拔速度快,在职。但这个人的性格呈现着一定的裂隙,表现出一种难以完全统一的矛盾或悖离。依照文本来分析,孔德武的性格主要由意志力、情感、智力三方面组合而成,而这三者却并不平等地在他身上体现出来,那就是军人的意志力,传统文人的情感和常人平庸的智力。

五十多岁的孔德武对漂亮女人有一种特

别的亲和力,尽管他的意志力不断把控着他。在第一次见到方韵时,他就心猿意马地对这个天生尤物多看了几眼;在几天后接到方韵的第一次邀请时,他要狠下决心才能把拒绝的话说出来,而当意志力艰难战胜情感后,他的心里就会升腾起些许遗憾和怅惘。方韵略施苦肉计,孔德武登门探望,替他捋散乱的头发放倒水,用舌尖试水温,然后半抱着她的身子喂药……种种细节都彰显了孔德武书生式的多情善感。潘金盈是印证孔德武情感的第二块试金石。在方韵那里,他是通过逃避的方式迫使已经绽放的感情之花凋谢,而在潘金盈这里,他本来丰富而脆弱的情感里又添加了对于“抑郁症患者”的怜爱和对恩人的感激,在此催化剂作用下,他索性放任他的似水柔情,花前月下厮守在一起。不仅仅对这两个美人惜香怜玉,在对待妻子和女儿时,他也是顺着、惯着、宠着;在对待几个战友方面,他对潘金盈的热情,在照片事件上对荆长明、程万盛的猜疑和愤恨等,都表现出与其年龄、职位不相匹配的急躁,表现出同他应有的意志力之间一种不切实的背离。

一般而论,作为一个核弹部队大校作战局长,他应当深刻而清醒地知道他所掌握的东西对于军队和国家的安全具有何等的重要,但如游戏一样地丧失应有的警惕性,观察辨别能力的缺乏和推理判断能力的缺失都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与时隔30年没有音讯而又长期生活

在国外的老战友潘金盈相见后,没有太多的思考辨析就稀里糊涂把妻子女儿交给他送到澳洲;面对道长的反复告诫乃至做道场送符咒,却依然点而不醒,启而不发;两次在深夜听到金盈发出正常人的嬉笑,目睹潘金盈诡秘的行为,还以自欺的借口一晒了之;在潘金盈最后摊牌时,对他连连发问,句句都是关于核弹的机密,他却仍然以病入的“病话”来自我解释,一直处于情迷意乱的状态之中。

这种不太融洽的性格组合,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生活逻辑,影响了作者对作品主题的表达深度。而造成这种情状的缘由是作者出于对情节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人物的性格。如果孔德武不是这种多情重意、惜猫怜狗的人物,如果他具备应有的职业敏感和辨识能力,那么,这部间谍小说的情节就不会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因而可以说,在《预警》中,人物形象是受情节支配的,情节才是作家更为看重的元素,它起了决定的作用。

也正是如此,在叙述上,作者安排了单线推进的叙事策略,这样就使故事情节不枝不蔓以饱满的劲头向前奔驰。这种单线结构也使得叙事节奏始终保持在中速以上,水随风行,波澜递进地向预定点演进,从而造成了巨大的阅读引力。那牵引着读者想一口气读完的原因,除了陌生化的人物背景(核导弹部队)外,最主要的正是这来自情节的艺术魅力。如果我们同意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家的三种可能性,即讲述故事、描写故事和思考故事的说法的话,那么可以说,《湖光山色》是在思考故事,《预警》只是在讲述故事而已。注重故事情节设计是一般通俗文学征服读者的惯常手法,在这个意义

上,《预警》是一顿丰盛的大众文化快餐。

但这并不是说《预警》没有深度可言,它的深度也是相当显在的,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作者本人希望表现的三种预警:对战友们的预警,让他们关注这场反恐战争;对社会的预警,希望社会关注恐怖主义;对人生的预警。其次,几名间谍之所以沦落为情报叛子和恐怖分子的社会原因——“乱自上作”。潘金盈、方韵和潘金盈原本都是好人,由于他们都经历了一段痛彻心肺的人生遭际不约而同地走上报复国家的道路,这已经逸出了反恐或谍战本身,尖锐犀利地指向了我们当下的时代和社会现状:基层政治、法制等体系运行中出现的种种乱象,下层官吏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欲望膨胀的精神状态,以及底层平民的生存困境等。这应当算作第四种预警,是发给国家的预警,也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预警。

期望《预警》像《湖光山色》一样有着厚重的深度可能是对周大新的一种苛求,对新的题材的开掘必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题材转换问题上,我还是愿意再提及周大新自己曾说过的话:人必须和自己生活的土地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深刻。实际上,即使周大新为了表现出新的思想而变换题材创作了《预警》,他仍然没有能够完全离开豫西南的故园,文本中孔德武两次返乡,乡村成为故事转进的一个重要场域。我们还注意到,文本的叙述语言基本是疏放的,对于大都市、部队大院和宾馆酒楼作者显然缺乏精细描写的耐心,只有在“自难忘”这一章节,写到家乡家人、农家小院和山间道观的时候,作者的文笔明显温柔真切起来,意象相对密集起来,节奏也平静舒缓起来。或许在作者的潜意识中,这才是他心之所系,情之所至的地方。

小说并非诞生于理论精神。军人不一定非要写出长篇的军事题材的作品,军旅作家也自然可以不穿军装的去书写作,作家顺从自己心灵的召唤率性而为,也许才是一种更值得持守的立场。但无论如何,周大新以一名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大家注意到恐怖主义以及它产生的土壤,以谍战或反恐故事艺术地表现了现代军人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另一面,在崭新的领域内传达出匡扶家国的忧患意识,其审美立场和理性精神都是很具开拓意义的。

■看小说

尔雅《第七日》面对死亡的咒语

《圣经·创世记》开宗明义:“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在六天内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并且赐福万物与人类。在第七日安息,且赐神这一天,定为圣安息日。天地同得大平安息。第七日,在尔雅看来,与其说是神的安息,不如说是生命的结束。若是从这点来读尔雅的《第七日》(《山花》2009年第12期),若是一道不可突破的咒语,面对这道咒语,每一个人都变得虚弱渺小无能乏力,每一个人都无法解除它。小说以蒙大奇的手法,从孤儿虫子的视角,闪现了小镇中几种生命的存在:被母亲扔下的虫子,孤独躺在古堡中死去的芳芳,受尽病魔折磨死去的多多婷婷,三块土豆换来的最后被疯子撕咬而死的土豆,死而复活吃狗粪的疯子,惯偷李有福以及多多叔叔和远在他乡的母亲等。小说脱离了故事、情节、背景、人物等常见的因素,也脱离了日常生活描写,直接将“镜头”对准生命的基本主题:饥饿、疾病与死亡,这种凸现与放大不仅让小说别具一格,也让这些被生活所淹没的基本问题得到无限放大,令人寻味再三。尤其是芳芳、土豆、多多婷婷这三位不同年龄不同性格却同样善良的女人遭遇与死亡,作者叙述虽简略冷漠,读者读来却撕心裂肺,一种对命运的无力感与对死亡的惶然感浸透纸间。从人物来说,这篇小說或许可以归为作者徐银系列,但若与最近两篇《多多叔叔的最后一天》《谁修理谁》(《飞天》,2009年第11期)相比,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可谓另类,且另类得让人寻味与琢磨,理解的惟一线索似乎便是题目与题记。作者尔雅介绍说,小说写于汶川地震后,骤然消失的无数生命让他感到一种无能为力,此篇小說记录其一二。或许,从此进入小说,更能体会小说和作者的意图。

叶舟《花开的时间》善意的楚门世界

与早期的小说相比,叶舟《花开的时间》(《小说界》2009年第3期)少了一份“愤青”的叛逆与嫉俗,却多了一份厚重与深思。小说分两条线索开始故事的讲述:一是私立美好医院的院长毛洪被病人家属冤杀案;二是即将面临高考处于花开时间的夏菁菁。这个开头似乎并不吸引,甚至有点寒酸涩滞,但当两条线索并成一个“楚门的世界”,夏村、学校、派出所,乃至受害人家属都加入到对夏菁菁守护秘密的行动行列之时,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立时变得鲜活紧张起来,整个小说也变得扣人心弦灵动光彩,让人不忍掩卷,紧紧跟随夏菁菁的身影,最后一份失手落地功败垂成的报纸几乎要让人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尖叫。小说中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对人物的处理,繁简得当,人物众多却不显杂芜,尤其在“楚门世界”中,人性深处的复杂与善良,被挖掘得淋漓尽致。(罗四锦)

刘士忠《罍粟》我本纯洁的罍粟花

刘士忠的《罍粟》总让我想起台湾电影导演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件》。不过,与电影不同的是,《罍粟》(《青海湖》2009年第5期)中的少年,有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精力旺盛,内心敏感,厌学,推崇“江湖义气”,对异性好奇,有着单纯真挚却又懂懂的爱恋,这就是少年“我”。一次偶然,少年“我”为了心中暗恋的姑娘夏雪雨而与社会青年和老师发生争斗,为了得到了不公平的处分。愤怒少年“我”用自己的办法,换来一支枪,却因失误,子弹击中了暗恋的女生夏雪。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只有血“在洒满灿烂阳光的水泥地面上汇聚成一朵大大的罍粟花”。我却忍不住加上一句《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件》中杀死心爱女友的少年小四的问话“为什么这个世界和我们想的不一样?”美丽罍粟花的罪恶谁谁的?少年的杀人举动从何而来?作者是无需回答这个问题的,但读者我却不禁为此而发问。《罍粟》是作者刘士忠略带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的第二部,在第一部《前街街十四号》(《青海湖》2007年第5期)中,作者借用惠特曼的诗说道:“每人像属于他或她而不是属于任何别人的一切。”或许刘士忠是在借小说“歌唱”成长的痛苦,然而这种痛苦却是每一个人都似乎经历过的。不过,从小说艺术角度看,行伍出身的刘士忠的“歌唱”又有些过于沉溺于“个人”,在我看来,即便是个人的歌唱,也是需要面对至少一个听众的。

本版责编:刘颖 饶翔

·文学批评·

第一感受 阅读与倾听

□韩作荣

彝族歌唱家姚林辉的散文集《踏歌远行》是一本集散文、歌词、曲谱合为一体的著作,并在书后附有姚林辉自己作词、谱曲并演唱的碟片。就这部著作而言,其本身便打破了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的界限,亦打破了文学与音乐的界限,让阅读的眼睛通过文字抵达心灵,并让心开窍于耳。一本既能看,又能唱与听的书,如同书中所描绘的能动的花和会跳舞的草一样,使文字有了灵性,词语有了旋律,并让声音蕴含了诚挚的情感和智慧。书本身以自己的独特性超越了寻常的文本,具有了某种开拓的意义。自然,这种文本的出现,与作者兼演唱者的多才多艺有关,一个集作词、谱曲、演唱于一身的全能型歌手,颇为罕见,而将自己对故土、民族和祖国深切的情感,以及自己创作的体悟和感受用文字固定下来,写成散文,似乎更是绝无仅有。鉴于此,我对这本书刮目相看。

在我看来,音乐是艺术之最,清空而质实的音乐,容纳了人类所有的经历,从感觉到最终的精神和谐。用贝多芬的话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人们将建筑、绘画、雕塑、影视作品与舞蹈列入可视的艺术,却将音乐与文学列入可听的艺术之内。看来,一个对声音敏感,并善于表达的歌者,应当是一个更宜于文学写作的人。

就姚林辉的散文而言,亦与我们常见的散文有别,她的写作都与原创性的歌词和音乐有着内在的联系,让我们领略她创作的每一首歌的来龙去脉、灵感之源,让我们深入理解一首又一首歌曲的丰富内涵和一位创造者的艺术才华;与此同时,她也写出了一位优秀歌手的人生遭际、成长过程;写出了那片红土地的生命之根、血缘亲情;也写出了民族文化的地域特征和民俗习惯。更重要的是,她写出了活生生的人,有着独特文化精神和心理内核的人,从行为中抽象出来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由文化所维系的一个民族的生存状况与社会规范。

我是从姚林辉的散文里进一步了解彝族以及哈尼族的状态,知道了彝族和哈尼族都源于中国北方的羌族。而哈尼族的山歌《迁徙歌》则唱出了民族之根,保留了两千多年前南迁的历史。知道了彝族自称“罗倮”,彝语中“罗”是虎,“倮”是龙,表现了彝家人生龙活虎、刚毅勇敢的性格。也第

一次知道了毛泽东主席将“夷人”改为“彝族”,认为“鼎彝”乃宫中之物,彝字有“米”有“系”,象征丰衣足食的典故。知道了寨子里的鸟语花香、欢歌笑语,人们高兴时唱歌、寂寞时唱歌,甚至生气时也用歌声来表达的那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火把节的来源,其特有的唱着哭的哭嫁习俗,天下少见的热情好客,彝族的赛衣节,姑娘的换裙仪式等等。尤其是彝家姑娘的帽子,上有两个小角是已婚,有一个小角是订婚,没有角则表明尚无意中人。这种种奥秘、鲜见的习俗,是走马观花,不身在其中想像不出的,也写不出来的。故而,她的散文不仅能帮助听众深入理解她所创作的歌曲,对我们深入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亦起到开眼界、由表及里的作用。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姚林辉情感的朴素、真挚、深切,以及她对艺术苦苦的求索。这,既深植于亲情、师友情之中,也体现在她的创作与歌唱之中。她是穿着母亲一夜未眠做成的花布鞋,吃着母亲做的一大袋炒面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故土的温馨、母亲的牵挂、月光丛中的家庭音乐会、听钢琴练声的日子,以及听朋友讲西藏的故事等等,都给她以心灵的滋养,让她在真正动心、动情的状态下写出了从心里喷涌的歌与曲,也写出了情真意切的文章。就歌词而言,我觉得她写得最好的一首是《静静的山林》。这首歌和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只有干巴巴的几条筋或是人皆知的几个象征符号的概念的歌词不同,是一种诉说的口吻;幽远的情境,深切的思念,黄昏的云霞,行云流水般的表述,孤月秋风,思绪绵绵,宁静恬美,颇有意境。而这首歌词的旋律,作者亦考虑与词的意境相合,将内敛含蓄的主调与前歌的高亢激情于一体,难怪会引来诸多的赞赏了。然而,最让我赞叹的,则是她母亲的看法,说这首歌“若是在静静的夜里唱,效果会更好些”。这是一位真懂艺术的母亲。故作者每写一首歌,都先唱给母亲听,体会到母亲觉得好听的歌,一般听众都喜欢。这已经有了白居易写诗“老妪能解”的意思了,也是姚林辉立志成为老百姓唱歌、唱歌的艺文家的具体实践。

姚林辉的散文,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颇有兴味的独特故事。从文中,我们看得出她的朴实、诚挚、谦和与善良,也能看出她不安分,甚至有几分顽皮的性格,和她勤奋好学的精神。一些动人的往事,写得真是生动。她写万蕴琼老师教师声乐的愉悦而又轻松的方法与细节描述,看似随意,表达得恰到好处,让喜欢音乐的人读起来也有收益。

一个小时总在坐在家门口痴想发呆的人,幻想世界的人,已走出家门,并开创出自己的世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她仍执著地探求着如何能把现代元素融入上山歌,而又能很好地保护山歌原有的音乐灵魂,我相信她能有新的开拓,写出更好的歌曲,继而写出更好的散文来。我们期待着。

■短评

品人生之茗 得思辩况味

——读杨莹散文随笔

□石 英

俗成的习见,提出颇具挑战性的质疑。如果说,在杨莹散文中,哪一部分最具独特发现与思想光芒的话,我觉得上述这类篇章确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杨莹的散文中,有一部分是写人的散文,我认为这部分也是写出了特色的。一般来说,写景当然也能包含着抒情,散文是比较容易出彩的,在我国散文园地中成功的范例比较多;相对来说,写人的散文并不那么容易写,弄不好还会落入类似小报告文学或短人物传记的尴尬。而杨莹在这方面把握与处理得比较适当,比较到位,其“奥秘”在于选角度、抓特点、显个性,以活秘之笔,写自然之人,不给人以生硬、板滞、造作之感。最值得称道的是她对当代女性,不仅熟谙其内质,而且通过少许音容笑貌的勾勒,尽显其神髓,正如古人所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见

《世说新语》)。从本集中写人篇章当可看出:活写则人生,硬作则人“木”。

一般论及散文,大都离不开抒情这一特质的散重,至今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已经过去。甚至常有人说:散文即情文,也不能说完全无理。但如何抒情,或情由何抒,却非单一的模式。杨莹的散文极少“跳”出来单独营造抒情文字,但并不因此说她的散文乏情和寡情;相反地,我倒觉得作者的情,在叙事中流露得最为充分。她的叙事方式往往是以情带事,叙中有情,而不是将叙事、抒情与说理截然分割开来。这样的叙事文字便增大了弹性与张力,读来不仅不枯燥,而且相当好看。譬如,像以下这段话:“我在长长的期待中,消耗着旺盛的生命力,也许,我所追求的那种浪漫爱情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像春天的天气,乍暖还寒,风云变幻,阴晴不定。也

■关 注

曾几何时,文学界除了有星光璀璨的著名作家、著名评论家外,还有众多的著名编辑,简称“名编”。称得上名编的人,必定曾编发过名篇,推出过名家。按照这样的标准,曾长期主持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后又担任过作家出版社首任社长的江晓天先生,无疑是其中屈指可数的一位。

在朋友津津乐道京城几大名编并问冯立三先生的看法时,冯先生说:“你说的都可以称作‘名编’,不过,我觉得应以晓天领衔才能显示公正。‘名编’以能编出‘名著’为标准。”在江晓天手里,主持编发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文学名著“三红二火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草原烽火》《烈火金刚》《创业史》)和《李自成》《风雷》《阿诗玛》等作品,这些名著如今大多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刘锡诚、冯立三二位先生感念江先生生前为文学界所作的大量默默无闻、不求回报的重要贡献,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江晓天纪念文集(为你骄傲)一书,帮助读者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下文学名编的成长历程,他的生活和心灵世界,进而窥览当代文学史的一道发展脉络。

江晓天的一生,几乎都是在约稿、看稿、编稿、写稿和评稿中度过的。他积极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认真审阅编发稿件,热情评论作品指点作家。经他手,发出了许多影响了几代人特别是几代青年阅读生活和精神成长的文化著作,包括翻译出版的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如《牛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凡尔纳科幻小说系列》等。在这位编辑家、评论家、文学活动家手里,一位位文学名家成长起来了。这其中包括了作家、名译家和名编辑。

编辑是作家摇篮旁的保姆,是护花使者,是华服背后的裁缝。所有的作家,背后都站着一位或几位影响其成长的编辑。编辑的辛劳和成就体现在自己编发的稿件、推出的作家身上。作家和文学的荣光同时便是编辑的荣光。而今,当一位辛劳了一辈子的老编辑在82岁时离开我们之后,重新回望他一生的功绩时,我们发现,江晓天的名字已经久远同诸多的经典名著、诸多的创作名家,同当代文学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文学史的书写不能忽略他。

不久前杨宪益先生去世,文坛惊愕,翻译“断桥”。而当江晓天去世,章仲钤去世,11月3日杨志广先生去世,文坛都在感叹“名编”断代。章仲钤先生生前似乎只做好了一件事:看稿编稿发稿。他的书房就叫“磨稿斋”。最近陈建功先生在《文艺报》上发文《爱事业 爱文学》,缅怀了章先生生前为编稿而物我两忘的诸多创作趣事,令人感喟不已。而53岁英年早逝的杨志广,去世前还一直在编发稿子。在为简牍散文集所作的简短序言《初秋之痛》中,他谈及自己从作者那里吸收到对于生死的直观看法,获得的鼓舞和力量,这在让我们伤感欣慰的同时,又深深地击穿了在我们柔软的内心,令我们扼腕唏嘘。又读到何建明和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撰写的怀念文章《我们是兄弟——为同事杨志广先生》和《杨志广生命中的最后十天》,我不禁深深叹息:这是一位多么热爱生命渴望生活的人,一位多么热情、敬业和优秀的编辑啊!

石湾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也说京城名编》,介绍了京城四大老名编: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和王朝琅。这些为新中国文学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贡献的编辑家,均已故世。孙晶芳发表的《“四大名编”的故事》,写到龙世辉、章仲钤和崔道怡、张守仁,其中,章仲钤和龙世辉已去世,张守仁和崔道怡先生已年过七十。每当看到崔先生在各种文学研讨会上慷慨发言,大声鼓呼时,我总觉得他还是青春年华。然而,他毕竟已是70岁的“青年”了!几个月前,看到他和张守仁两位先生在为“放歌六十年”征文奔波、组稿、编稿时,我又不由得感叹:好编辑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我衷心祝愿这两位我敬仰的名编保重身体,青春不老!

同时,我更希望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中青年文学编辑更快地成长壮大,希望有更多的有为青年才俊不断加入到编辑行业中来。

在2008年11月召开的第七次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我提出:“文学期刊特别是像《人民文学》《收获》这样的刊物的作用,可谓一言九鼎、举足轻重。文学期刊的价值取向和艺术取向极大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它的作用与文学批评相近,有时甚至具有比文学批评更大、更直接的影响力。因此,加强文学期刊的艺术品位建设显得尤为必要。”而期刊的艺术品位,归根结底便是编辑的艺术品位。编辑的品位、修养、素养和学养几乎决定着一份文学报刊、一家文艺出版社的品位。因此,优秀编辑、名编辑对于文学报刊社的作用,可谓是不胜枚举。

其实,我也应该感到乐观,就我有限的交往和了解,我知道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收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文艺报》《北京文学》等众多文艺报刊社,许多新露头角的编辑正在崛起。他们会否成为新的名编,成为新中国文学史无法抹去不能遗忘的编辑家,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文学呼唤名编,作家呼唤伯乐和知音。

许,真正的爱情就是如今已经转入正常天气的平静而又平常的夫妻正常生活。婚前,一个人的爱情有多深,感受到的爱情的影子有多长,都取决于他对所爱的那个人的迷恋程度,人总是要结婚的,当他一旦拥有爱情。婚后,爱情的影子总是要变短的,有时,竟也会感觉不到它。人的一生又怎么可能去不断遭遇各种爱情,再婚,恐怕又是在体验一种重复。”(杨莹:《爱情的影子》)

杨莹的文学语言是比较干净的,丰腴而不累赘,极少废话。她一般不尚雕琢,但也并非漠视必要的文采。如当作者谈及散文创作时,她说:“散文像时装一样随意、无定式、无定法,或红或绿,或长或短,或松或紧,或素或艳,或现代或古典,或浪漫或凝练,类别多样,款式极多,美丽缤纷。”(杨莹:《散文之我见》)这话说出了她对散文的观点,也在表达上注意了话语的节奏,精致与色彩。

作者华莹还年轻,今后在散文的写作上难免还会有一定变化和发展。在这方面,如果要我说点什么的话,那么我认为:已经基本形成的写作思路固然是不错的,但还不必囿于既定者,适当范围地展开笔墨,不必担心会破坏了自己的基本特色,也不会影响独具的所长,因为,纵有变化,然万变不离其宗也。

文学呼唤名编辑

□李朝全